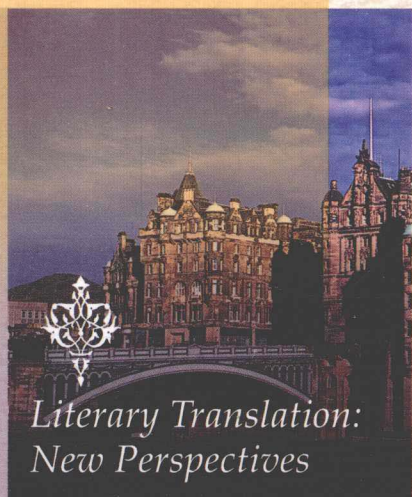


京华学术文丛

文学翻译 新视野

翻译问题是目前国内很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外语专业师生对翻译的研究必然会涉及两种文本在语言转换层面出现的问题；中文出身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不能完全摆脱借用中文译本作为研究工具而产生出来的研究对象失真的质疑。



李冰梅 /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该项目系首都师范大学“211”人才规划项目
本著作得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11”工程项目出版资助

文学翻译新视野

李冰梅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新视野/李冰梅 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301-16604-8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9994 号

书 名:文学翻译新视野

著作责任者:李冰梅 编著

责任编辑:梁 雪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604-8/1·229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170 毫米×23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60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言

有人说翻译是一门科学,有人说翻译是一门艺术,有人把翻译家称为“传声筒”,有人称他们为“媒婆”,不同的界定和隐喻显现了人们审视翻译的不同角度。看问题的角度必然决定人们对问题认识的程度。北宋文学家苏东坡的视域论为我们今天客观地认识和解说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提供了最佳的依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该诗以观山为题揭示了两个普遍存在于人的认识能力上的现实问题。第一,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事物的认识必然存在差异;第二,人的视野受到所处位置的限制,全景式的视野非个人所能及的,因此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将这种哲学思考运用到对翻译活动的认识上,我们就能根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对象将其剥离成不同的层面。如果把翻译视为一门科学,研究科技著作、使用说明、法律文献等去情感化的应用文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的可操作性,这一观点是被当代技术支持的。如今,计算机翻译软件的设计和研发从语法和词汇层面上基本解决了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但涉及词义的文学色彩和文化内涵、语法结构所含的意义、谋篇布局、文本风格和写作特征等超语言形式等问题时便使翻译的科学观没有了说服力。这种局面将翻译的工具性和创作性分开,也将翻译技巧的概念与翻译创作的概念分开。在传统的翻译课上,翻译技巧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常规的项目是根据两种语言的特点和差异在翻译中采用“增补、省略、词性转化、正反译法、分句与合句、抽象与具体”等技巧处理非文学文本;而对于文学文本,一些教科书采用“翻译实践”这一巧妙的术语。言其“巧妙”是因为它没有画地为牢的固定模式,也符合文学翻译的特点。文学翻译重在“文学”二字。文学是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是人学。每个文学文本都有很多个性特征,如作者的风格、时代信息、民族认同、社会意识形态、文化诗学等属于某个民族、某位作家、某个时代、某种文学范式所特有的印迹,将这些印迹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另一种文学范式时,译者无处不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这种选择常常是顾此失彼的两难选择。中外翻译史上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方法与策略的选择就是译者面对的两难之境,进也难,退也不易。然而这个两难之境却给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研究者可循此进入文学翻译研究的广阔天地之中。全球化视野中的翻译研究,研究的是翻译行为在发生之前、发生的过程中、发生之后所涉及的文本内的变化和文本外因素对文本变化的干预,从中透视作为文学和文化交流主要手段的翻译所表现出的两种文化的关系、文学间的相互影响、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立场、意识形态交互作用等。超越语言转换层面的翻译研究带有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帮助我们重新

认识翻译在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把对文学翻译的研究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学关系的背景下,以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为视野,探讨在文化交流和文学间相互影响中翻译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文学影响越来越大,翻译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翻译对译入语国家文学范式的影响到文化意象在译入语中的失落与变形等,探讨译本现实背后的相关问题,重新认识文学翻译的现实与意义。

本书不是为外语学习者翻译技能的培养而编,而是为外语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编,目的是帮助他们认识以翻译为介体所发生的一切,对翻译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对翻译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梳理、对文学交流活动进行描述,更好地研读所学习的外国文学文本和翻译本,更充分地认识译者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和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更自觉地对译者和译作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而不仅仅停留在对译者的译作做简单的价值判断上。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翻译中的热点问题,围绕着翻译研究中常提及的话题和有争议的问题展开分析;第二部分是中國部分古代文学经典的译介与个案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仅选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介绍和几个研究案例,为做翻译研究的学生提供背景知识和研究方法。通过这两部分的学习,学生能够学会从理论层面上审视翻译中的各种问题,了解中国文学经典西传的历史和现状,培养和提高学生从更广阔的视野对文学翻译现象的进行分析和鉴赏,同时为学生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选题和进一步研究提供有效的参照。

如今,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的意义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传统模式的限制。随着翻译理论不断发展,对翻译这个伴随人类成长的活动进行研究必将使人们更清楚地看清自己,同时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他者世界。在此意义上,本书将有助于外语学院、文学院的学生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两个层面提高对文学翻译的认识鉴赏能力。

目 录

第一部分 文学翻译中的热点问题	1
一、文学翻译的本质及特点	1
1. 多重因素介入翻译	1
2. 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	4
二、翻译的理想与理想的翻译之辨	8
1. 翻译的理想	9
2. 理想的翻译	12
三、译者主体性问题	17
1. 负面隐喻下的重负	18
2. 译者主体性呈现	20
四、译者的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22
1. 译者的文化身份问题	22
2. 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	24
3.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之间的动态关系	27
五、认识文化差异	30
1. 英汉文化差异	30
2. 文化空缺的几种表现	32
六、操控文学翻译的三个因素	36
1. 诗学	37
2. 意识形态	44
3. 赞助者	45
七、芙洛托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46
1. 实验性女性主义写作及其翻译	46
2. 翻译场中的女性主义	48
3. 重振父权社会中“丢失”的妇女作品	50
4. 进一步的更正措施	51

八、小说翻译中的风格重构	53
1. 风格可译论	53
2. 译者风格举证	55
九、伪翻译的居间性	60
1. 伪翻译的概念的沿革	61
2. 伪翻译存在的原因和用途	64
3. 伪翻译的二重性	67
十、文学经典复译的必要性	69
1. 多译本存在的必然性	69
2. 文学经典复译的意义	71
十一、文学翻译不可逆归性	73
1. 回译的类型及作用	73
2. 回译对于文学翻译的意义	75
3. “People Hide Their Love”的“回译”实验	79
 第二部分 中国部分古代文学经典的译介与个案分析	83
一、西方汉学家英译的《诗经》	83
1. 从节译本到全译本	83
2. 《诗经》翻译三难	88
二、英美国家唐诗的英译	94
1. 唐诗在英国的译介	94
2. 唐诗在美国的译介	95
3. 唐诗英译之难	96
4. 著名诗人诗作翻译赏析	100
三、韦利译白居易诗对英语诗歌的影响	111
1. 韦利对白诗的偏爱	112
2. 再现白诗的不同风格	114
3. 韦译白诗在英语文学中的经典化	122
四、汉语“朦胧诗”的跨界呈现	125
1. 英语中 ambiguity 的多义性	125
2. 《锦瑟》代表的“朦胧”	127

3. 名译传递的“朦胧”	128
五、庞德对汉诗意象的借用	134
1. 意象派运动的领袖	134
2. 《神州集》对汉诗的再创造	136
六、20 世纪的宋词英译	142
1. 词的独特形式与情趣	142
2. 标记性特点的翻译	144
3. 《钗头凤》和《声声慢》的英译与赏析	149
七、英语世界三大名著的翻译略述	158
1. 部分小说英译简介	158
2. 《红楼梦》英译史略	161
3. 《水浒传》英译史略	165
4. 《三国演义》英译史略	167
八、《西游记》英译个案研究	169
1. 韦利《猴》中的创造性翻译	170
2. “援耶入佛”的李提摩太译本	181
九、译者林语堂的《浮生六记》	200
1. 林语堂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的互动	201
2. 林语堂文化思想与《浮生六记》的主题互应	204
3. 林语堂对译入语文化意象的借鉴	206
十、辜鸿铭对《论语》翻译的中西格义	208
1. 辜鸿铭的西式教育与中国情怀	208
2. 《论语》翻译的格义之法	210
3. 借西方思想家之言引证儒家思想的普适性	214
附录一 现当代英译中国文学的英美汉学家	217
附录二 现当代英译中国文学的中国翻译家	244
附录三 现当代英译中国文学的海外华人	256
后 记	263

第一部分 文学翻译中的热点问题

一、文学翻译的本质及特点

兰德斯 (Clifford E. Landers) 在他的《文学翻译: 实践指南》(*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①一书中对“文学翻译”做了如下说明:“人们通常认为译者只需处理文字,但这只是部分正确。无论他在翻译什么,他都需要与思想打交道。而文学翻译家需要与各种文化打交道。从非常实际的意义上讲,《时代周刊》在十多年前将文学翻译家称为‘文化信使’是正确的。”将文学翻译家比喻为“文化信使”就是承认文学翻译中文化传递的本质性意义,而这种文化的传递是以异国特有的文学样式为载体的,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打开了一扇了解异国风情和文化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学活动,对其展开的研究同样具有很大的复杂性。这里我们仅从文学翻译的两个关键词,即“翻译”和“文学性”入手探讨其复杂性。

1. 多重因素介入翻译

汉语中“翻译”一词可以作动词、名词、修饰语而词形不变,而在英语中则有不同的词形:translate, translating, translation, translations, 这些词不仅词形不同,在表意上也略有差异。translate 和 translating 显示的是翻译过程(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可数的 translations 则是翻译的结果(the product of translation process),即通常意义上的“译本”,而大写的 Translation 是对翻译现象的抽象表述,休森和马丁(Lance Hewson & Jacky Martin)指出,在这个层面上“翻译是一个歧义性术语,它既可指翻译生产(translation production),又可指翻译结果(translation product)”。^②虽然这几个词的所指不同,但是出发点或者说词根都是一样的“translate”。“translate”的行为主体是“人”,他/她应该为“translate”这个动作的全过程负责,他/她与一般的人差别在于他/她具有 trans-的能力。翻译所涉及的原文、源语文化、译者、译文、译入语文化等多重因素中,每个因素都是可变的因素。原文由于读者的阅读而具有开放性意义,这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效应;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都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这使得对产生于源语文化或者进入译入语文化的文本的解读都有了历时性特点。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文学思潮和文化形态,文本框架内的主流诗学引导译者将原文改写为符合社会审美取向或者诗学特征的译文。在

^① Clifford E. Landers: *Literary Translation: A Practical Guide*,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72页。

^② Lance Hewson & Jacky Martin, *Redefining Translation: The Variational Approa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1.

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诸多因素中最活跃因素,他首先以读者的身份进入对原文本的阅读评价之中,在对选定文本的翻译中,他的文化身份、民族认同、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等都会介入从理解到翻译的过程,这些因素的干预是同一原文本能够拥有多位译者和不同译文的原因。在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它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它不时地影响或干预译者的思维或行文,甚至译者呼吸的空气都可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所操纵。^① 不同译者翻译的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接受的情况差异很大,影响译本接受的因素很多,如译者在译入语中的权威地位、译入语的文化诗学、译入语社会对原文本国的热情、两国交往关系的程度、源语国与译入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等。对翻译多元化的关注带来的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当代翻译理论界的一大特点,翻译理论家从各自的研究立场出发,在翻译理论模式与研究方法上互相借鉴,对翻译活动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翻译研究缘起于翻译活动,翻译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身带有方向性。认识翻译活动中的方向性关系到翻译研究的方向性,关系到我们探讨翻译中各种问题的角度。翻译活动是将一种语言翻译为(translate into)另一种语言,译者是完成翻译活动的主体。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外语翻译成母语的过程是“向内”翻译过程,将母语翻译成外语的过程是“向外”翻译过程,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过程反映在译者身上不一样,其翻译效果与译本接受自然也不一样。在当代文化学派的“翻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②的叙述中包含了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这样一个逻辑推理。译者的生长环境和知识背景使他对外来事物的判断有了“文化预设”(cultural presupposition)标准,因此他就失去了做一个“法官式”译者的条件。当代的各种翻译理论普遍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译者受文化(通常是母语文化)制约将自己的文化观作用于译本上,这一点反映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译者将外语文本翻译成母语文本的过程中。中国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现实已经证实在译者所做的向内与向外的翻译中,向内翻译的数量和质量都大于和好于前者。当然,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很多人有机会到国外生活和学习,他们对国外的文化、生活方式有较好的认识和体验,但是由于他们的母语文化观念形成于早期的受教育阶段(一般认为从家庭教育到高中),文化观念一旦形成,他们就会自觉地用它来衡量一切外来文化,即使是生活在国外的环境下,他们的母语文化仍然发挥作用,因此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摆脱了母语文化影响的译者,他的翻译依然有文化倾向。现实翻译中可以有一个译者用母语以外的另外两种语言完成语际翻译的情况,但多数都局限于小语种或者古代语言之间的翻译上。从译者角度来看,“向内”或者“向外”翻译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翻译效果、译本接受等方面均有不同,导致翻译研究也因此具有了方向

① Bassnett, Susan and André Lefevere, ed, *Translation, History &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 1990, p. 13.

②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2, p. 6.

性。在翻译研究中,许多研究者试图建立一种普遍的原理以说明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方向性的存在,这些试图阐释普遍原则的理论通常只能说明翻译中的一种情况。因此,在翻译研究中阐明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非常必要的。翻译研究中的方向性意识在研究者设定译学界的术语时就随之产生了,如源语(source language)、译入语(translated language)、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指定文本(given text),以及由此衍生的源语文化(source culture)、目标语文化(target culture)等,这些术语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都会因译者的文化归属而有具体的方向性指向。翻译研究的方向性也表现在翻译研究者的论述中。当代著名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谈到翻译的任务时说:“既然翻译的任务是使异域文本在本土的表达易于理解,那么利用翻译的制度就容易受到来自不同的、甚至是不兼容的文化原料的渗透。”^①他论述的出发点是译者将异域文本译介到本土的情况。由于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涉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挥作用的事实,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同样带有方向性,从传统研究话语常见的“忠实”与“背叛”、到当代研究中的“归化”、“异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除了这些二元对立式的术语本身显示研究者的倾向之外,还有各种翻译理论适用的倾向性。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强调“对等”原则,“对等”不是“平等”,是译文要以原文为标准,这种翻译理念突出了原文的地位,而译文只是原文的附属品;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从翻译目的出发,提出忠于原文不是评判翻译的唯一标准,译本面对的是译入语文化,应该由译入语文化最终决定译本的意义和价值;阐释学派的翻译理论借用了哲学阐释学的基本原理,认为翻译与阐释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翻译即理解,译者带着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阐释。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明确指出这种阐释性的翻译可以有两种途径:一个是译者不打扰原作者,带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使作者靠近读者。^②施莱尔马赫所提供的这两种途径本身都含有方向性,而在理解与阐释中译者的“前理解”或者“前见”对翻译最终的文本倾向有很大的干预作用。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将翻译的过程看作阐释的运作过程(the hermeneutical motion),这个过程上的每一步,即信赖(trust)、侵越(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补偿(restitution)都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道说”(Sagen);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所使用的术语,更昭示其研究上的方向性,“文化改写”(rewriting)和“名声的操纵”(manipulating)都是顺应或反叛译入语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诗学的结果,而决非指有没有文化归属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诗学。将翻译纳入历史、社会、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它们对于译者向内翻译和向外翻译的影响是不同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了传统翻译理论中译文依附于原文的观点,甚至认为原文要靠译文才能生存下去,并且文本的生存不是靠原文本身所包含的特性,而是依赖于译文文本

①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80.

②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published in 1813, see André Lefevere,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Taylor and Francis Books Ltd., 1992, p. 149.

所包含的特性。译文的制造者——译者个人的文化身份对于译文本是以“归化”还是以“异化”的面目问世有着很大的影响。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他对拟译文本的选择、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策略、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等问题。

2. 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

国内外关于翻译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加以确定。不同的翻译家和研究者持不同的观点。^① 中国现代学者林汉达说:“(正确的翻译)就是尽可能地按照中国语文的习惯,忠实地表达原文中所有的意义”。前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家索伯列夫说:“翻译的目的就是把一种语言中的内容和形式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前苏联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美国的《韦氏新文学辞典》给翻译下的定义是“to turn into one's own language or another language”(转换为母语或者其他语言)。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Eugene A. Nida)说:“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从以上列举的几位翻译理论家的定义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从语言转换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翻译现象,是把翻译看作一种技巧或者工具,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工具的翻译研究如果将研究的对象设定为非文学翻译,如科技翻译、法律文献翻译、说明书翻译等从语言对等的角度研究译文原文的对应关系是可以的,但是当我们的研究对象设定为文学翻译时,仅从语言层面上对于语言转换的单位、转换的方式进行研究则无法解决文学翻译中所含的人文特征。^② 翻译研究发展到今天,特别是经历了西方翻译理论界倡导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之后,已经负载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文学特征,这使得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上开展的活动,它具有更多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属性。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在转换时必然受到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就决定了翻译实践及翻译研究的人文性质,而非“科学”一词所能解释得了的。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它的本质特征,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它是译者让译文在译入语国家延存和产生影响的再创作活动。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也就承认译者独立的创作空间,承认社会对它的反作用,承认翻译活动的开放性。

文学翻译的本质在于译作的“文学表达”,也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作品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因此文学翻译的评价应纳入人的审美系统中来。同时,文学翻译在审美创造上又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它同其他艺术创造最大差异,也是它的本质特征的另一个方面。文学翻译对原作的依赖性和从属性,限制了译者的艺术创造的自由度。“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具体

① 黄忠廉:《翻译本质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② http://www.fane.cn/article_view.asp?id=308, 2009年8月20日访问。

地说,就是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而非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以外的各种文体,如各种理论著作、学术著作、教科书、报刊政论作品、公文合同等等。其次表现于语言形式的不同。文学翻译采用的是文学语言,而非文学翻译采用的是非文学语言。第三是翻译手段不同。文学翻译采用的是文学艺术手段,带有主体性、创造性,而非文学翻译采用的是技术性手段,有较强的可操纵性。鉴于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我们对二者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如果说,我们要求非文学翻译要以明白畅达、合乎该文体习惯的语言准确地传达原作的内容,那么对于文学翻译,这样的要求就远远不够了。文学作品是用特殊的语言创造的艺术品,具有形象性,艺术性,体现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具有能够引人入胜的艺术意境。所以,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作家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以便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把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的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①在翻译领域里,由于对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认识模糊,人们有时会因看不到对象的差异、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陷入自说自话当中。

就“文学”这一术语而言,学界对其认识也呈现多样化,生成了莫衷一是的“文学”概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媒介,这一点没有异议。《尚书·尧典》中的名言“诗言志”是最早的文学观念表述,此中“诗”的功用和特征都是通过“言”得以体现的,而“诗”字(表现了诗的原初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言”(诗人之言)。如同中国语言中的“文”字的本义是“文字”一样,英文“literature”(英文 letter,拉丁文为 litera),即最小的语言单位。在古代的西方,柏拉图《斐德若篇》即说文学艺术家天生具有语言才华^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认为:文学(诗)在摹仿方式上,诗人与画家或其他形象的制作者一样,通过语言表达自己选取的摹仿对象,他诗人在这方面拥有之“特权”。^③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丁·沃伦(Austin Warren)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中指出:“‘文学’一词如果限指文学艺术,即想像性的文学,似乎是最恰当的。当然,照此规定运用这一术语会有某些困难;但在英文中,可供选用的代用词,不是像‘小说’或‘诗歌’那样意义比较狭窄,就是像‘想像性的文学’或‘纯文学’那样显得十分笨重和容易引人误解。”“文学作品并不像一个三角形的观念、一个数字的观念或者‘红’的特质那样具有相同的本体论的地位。与这些‘实体’不同,首先,文学作品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创造的,其次,它是易于变化的,甚至易于遭到完全毁灭的。”^④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性往往通过诗论集中表现出来并被概括为“诗意”、“韵味”、“兴趣”、“神韵”、“意境”等术语,西方则有“诗性”(Poetical)之说。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则明确以“文学性”作为文学理论的起点。文学理论发展的历程显示:文学创作不断进化,对于文学规律的认识及理论表述随之而生成。^⑤“文学”这一概念也逐渐形成了一些

① 郑海陵:《文学翻译的本质特性》,中国翻译网,2004年2月29日访问。

②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③ 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77页。

④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页,第170页。

⑤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相对稳定的内涵。这些内涵体现了人类对于文学活动需求的相对一致性,这或许就是关于“文学”实现基本共识与尝试性阐释理论存在的可能性之基点。关于文学的基本共识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第一是创作与文体方面,另一个是文学观念方面。在创作和文体上,“诗”(韵文)和“文”(散文)两大类文体样式至今仍然是最流行的文体,其中“诗”(韵文)所具有的语言和思维的特征(与“诗意”、“诗情”、“诗思”、“诗言”、“诗象”、“诗材”、“诗境”、“诗兴”、“诗性”、“诗学”等术语等共生互明),成为“文学性”的重要标志。文学观念方面最大共识主要有四方面表述,即关于文学的语言、情感、形象、想象的论说。大量见于中国和外国文学理论的修辞论、意境论、文采论等无一不是由语言的特性体现出来的文学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学语言的张力

中外文学理论中被经常论及的文学特征也与语言性有关:追求“言外之意”关乎“言”,运用隐喻象征依靠“言”,文学思维(主要是想象)也离不开“言”。不论何种新锐极端的文学理论学说,都无法逃脱语言性的问题;西方文学理论近来又重归语言本体的分析,这都说明语言性在文学性中起点的、根本的意义。相关的论说遍及整个文学理论的历史。与日常语言不同,文学语言表现的是“言有尽,意无穷”的意境,这就为翻译设置了难题。

(2) 情感表现的复杂性

审美情感既是文学自身的特点,也是文学创作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因此,作为审美情感的语言呈现的文学其情感性是使文学具有审美性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文学用以抒情,文学的发生也来自人的感情活动。中国古代大多数文论一致认为“情性”在特殊的语言方式(如吟咏)中得以表现,是写“诗”或行“文”的基本特点。西方文论中的情感(心灵)本质论也极为丰富,这一认识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史。当代美国文学理论家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 1895—1982)在她的《情感与形式》、《艺术问题》、《心灵:论人类情感》等著作中都反复论说了情感在艺术(包括文学)中的核心意义,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比如“一首抒情诗的主题(所谓‘内容’)往往只有一线思路,一个幻想,一种心情或一次强烈的内心感受”,“抒情诗创造出的虚幻历史,是一种充满生命力思想的事件,是一次情感的风暴,一次情绪的紧张感受”等。^①对此,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予以认同。

(3) 意象审美与形象塑造

文学的形象特征也得到了古今文论家的广泛认同。在关于文学起源的古老言说中,不论是中国的“感物”说还是西方的“摹仿”说,都包含了文学摹写自然景物或社会人事之“象”的认识。文学将审美感受形象化的特点也得到了中外理论家的反复陈说。在西方文学理论中,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始就讲文学的“临摹其状”、“制造形象”。在现实主义的“典型形象”论中,在象征主义和20世纪欧美“意象派”(Imagism)诗论中,文学的意

^①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00页。

象性始终是作为文学的本质因素被反复论及的。意象(形象)性是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共性,意象(形象)性使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意义就在于在“言”、“意”之间增加了“象”的环节,将审美意蕴通过形象化方式(比兴、象征)间接地传达给读者。中外文学理论都承认,文学文本的基本样式是通过文学语言塑造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许多文学理论涉及的范畴和流派都与文学的意象(形象)性有关。

(4) 想象与虚构

这一性质关系到文学的思维特质,是由情感(心灵)性决定的。《韩非子·解老》论“象”时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作为观念的“象”虽然得自于客观物象(即“生象”),其本义并非实物的形状外貌,而是由此及彼、由局部想见整体、在想象中形成的主观之“象”、意中之“象”。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历来极为重视想象,并将想象性视为文学的特质。在中国传统诗学中,“兴”最富于文学本体因素的概念,而“兴”的重要含义就在于言外之意的审美想象。王夫之《船山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唐诗评选》中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有“兴”才可以称得上“诗”。想象性是文学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

西方文学理论也极为重视想象和虚构的意义。达·芬奇说:“在想象的自由方面,诗人可与画家比肩。但这是绘画最薄弱的一面。”^①黑格尔《美学》:“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想象和纯然被动的幻想混为一事。想象是创造性的。”^②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说:“如果我们承认‘虚构性’(ficti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是文学的突出特征,那么我们就是以荷马、但丁(Dante)、莎士比亚、巴尔扎克(B. Balzac)、济慈(J. Keats)等人的作品为文学,而不是以西塞罗(Cicero)、蒙田(M. de Montaigne)波苏埃(J-B. Bossuet)或爱默生(R. W. Emerson)等人的作品为文学。不可否认,也有介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例子,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的作品就很难否认它是文学,另外那些伟大神话主要是由‘创造’和‘虚构’的片段组成的,但同时它们主要又是哲学著作。上述的文学概念是用来说明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用来评价文学的优劣。”^③卡勒也明确指出了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直具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文学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主要就表现在其想象意义以及对现实的虚构关系上。

如前所述,文学的丰富内涵及其与各类文化现象的复杂关系造成了“文学”普遍性理论存在的困难,也为文学翻译的欣赏与批评带来了诸多争论的问题。

对文学翻译的认识需要在对文学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提高。文学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学审美的过程。文学翻译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翻译再现原作的

① 章安祺:《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7页。

③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艺术美;第二,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其创造性的程度是衡量它审美价值的尺度。从文学翻译活动的内涵看,它是一个由阅读、体会、沟通到表现的审美创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通过视觉器官认识原作的语言符号,这些语言符号反映到译者的大脑转化为概念,由概念组合成完整的思想,然后发展成为更复杂的思维活动,如联想,评价,想象等等。译者阅读原作时,头脑中储存的思想材料与原作的语义信息遇合,达到理解和沟通,同时他的主观评价和情感也参与从阅读到翻译的全过程。译者主体对原文的解读令其通过译语最终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谬误的。然而,不管译作正确与否,翻译活动本身无疑是一种创造,因为它涉及译者的想象、情感、联想等审美心理因素。对于文学翻译的审美本质,我们还可以从译者与原作的审美关系来理解。以往研究文学翻译,人们偏重于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待翻译过程,注意力往往集中于译者的正确理解与表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是被动的,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原作后面爬行。这种以理性为中心,以语言学原理为基础的翻译模式对于非文学翻译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就未免过于简单了。文学作品是一个复杂的艺术整体,它的内容丰富多彩,可以是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可以是一个人的瞬间的感受,可以是一幅宏伟壮烈的战争画卷,可以是一段富有诗意的爱情故事,可以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可以是某一段奇特生活的写照。总之,文学作品容量极大,并且处处流露着艺术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与原作之间是审美关系,译者的审美趣味、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直接关系着能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艺术美。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既是原作艺术美的欣赏和接受者,同时又是它的表现者。从欣赏、接受到表现,有一个重要环节,即译者的审美再创造,或者叫做心灵的再创造,情感形式的再创造。从国外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文学作品要体现自身的价值,必须通过读者阅读。不然,它就是一叠印满文字符号的纸。艺术作品为人们提供一个多层次的未定点,人们通过阅读和理解填补空白,将其具体化,最终使作品的意义从语言符号里浮现出来,译者凭着超出常人的文学修养和审美力,阅读、透视和体会原作的方方面面,再以他的创造能力把自己的体会和理解表现出来,最终完成翻译过程。译者的审美视角、审美力和表现力因人而异,所以一部原作会有多部不同的译本。

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翻译。由于翻译对象是文学文本,原文本自身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而文学翻译要求再现原文的文学性。文学翻译目的是要传播异域文学与文化,这就要求其翻译文本必须符合读者对文学作品审美需求和接受心理。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学体系的不同,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完美地再现原文的文学性,甚至对原文本进行再创造,是文学翻译中的一大难点。

二、翻译的理想与理想的翻译之辨

在这个看似文字游戏的题目中包含了翻译研究有史以来饱受争议的内容。翻译理想与理想的翻译是两个不同话题,但又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它们承载了人们对翻译活

动最理想状态的想象。

1. 翻译的理想

在西方经典《圣经》中,有一个关于“巴别塔”(Babel Tower 也译“巴比伦塔”或者“通天塔”)的著名传说。巴别(babel)在希伯来语中有“变乱”之意。据《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中的记载,人类早时候都住在一个地方,讲同一种语言。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希望兴建一座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看到了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的言语不通。这样造塔的人们只好停工并从此分散到各地。留下的这座塔就被称为“巴别塔”。这个故事讲了几层意思:一是语言对于人类成就伟业的重要性;二是同操一种语言的人类具有威胁上帝的力量;三是人类知道自己联合起来的能量,因此从没放弃学习他者语言和重建巴别塔的努力。翻译就是人类渴望打破自身的孤独以便认识更广阔世界的手段,并且是一种最为行之有效的沟通行为和手段,不管是在实际运用上还是在研究上都广泛的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人们的心中有着一“翻译的理想”。实际上,“翻译的理想”就是让所有操着不同语言的人能够沟通,说这种愿望只是一种理想,因为上帝并不是把人类的语言只变成两三种或者七八种,而是变成数千种,人的能力无法和不朽的神相比,在人的有生之年要掌握十几种语言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数千百种。但人类是聪明的,他们把这种彼此沟通的努力放到了人类历史长河之中,通过学习和翻译,并通过两两语言间的互译,相交成一股股的涓涓细流,汇入到历史长河之中。“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①道出了对翻译起源的艺术概括,而“通天塔应该是神话起源之神话、隐喻之隐喻、叙述之叙述、翻译之翻译”^②说的也只是一种“无源之源”式的期盼,表达了人在认识上的限制和对语言世界的想象。

历史上留下的许多译本展现了人们彼此交流的现实,对译本的评论体现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希望。这就让人们在欣赏着自己创造的翻译史的同时,也常常对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质疑,在质疑中不断提高翻译水平和翻译研究水平。人们质疑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可译与不可译,这个问题直接反应了翻译理想的建构与破灭。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争论伴随着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持不可译观点最极端的是诗人对诗歌翻译的抗议。诗歌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它是形式和内容高度融合的一种文学样式。诗人通过精妙地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诗歌的形式与该语言的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有很强的民族性,这就为诗歌的翻译带来巨大困难。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一位偏重哲理性思考的保守主义者,他关于诗歌曾说过这样一个绝对的论断: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诗即译中所失)。苏珊·巴斯奈特将这句话解读为诗歌是某种摸不着、道不明的东西。尽管诗歌由语言构成,但它却不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全一卷古代部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② 这段话的英文很有趣:It would be the myth of the origin of myth, the metaphor of metaphor, the narrative of narrative, the translation of translation, 见 Derrida, in *Schulte and Biguenet*, 1992:218.